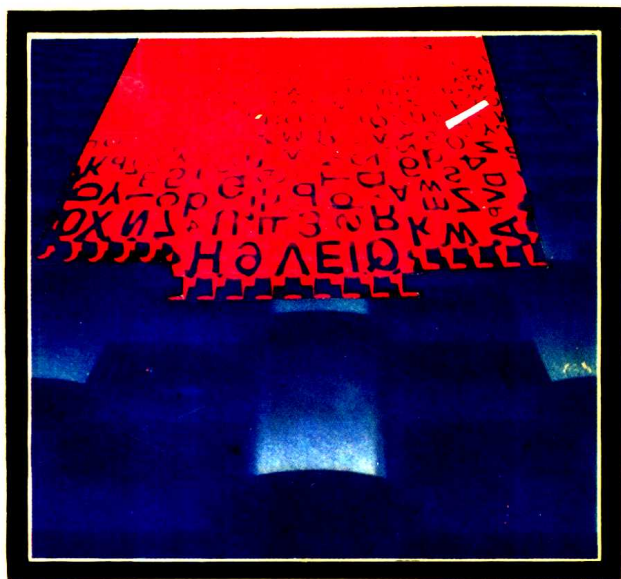


大千語言世界叢書

羅康寧 著

藝術語言和 語言的藝術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大千語言世界叢書

藝術語言和 語言的藝術

羅康寧 著

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湘] 新登字 011 号

艺术语言和语言的艺术

罗康宁 著

责任编辑：南 德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787×960 32开 5.5印张 108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₇—81031—057—7/H·005

定价：2.35元

大千语言世界风光无限

(代序)

当代社会语言学家 W·拉波夫说过：语言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语言是人类在社会中互相传达各自的要求、思想和感情的工具，语言学必然是“社会的”，难道还有可能存在“非社会的”语言学？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而不是一个纯正的科学象牙塔。

然而语言世界在本世纪的学术视野中确实封闭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把语言系统作为一个均质的符号系统来研究，虽然促进了语言分析方法的精密与完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纯语言的研究很象一种智力游戏，研究者不是从语言现象中发现结构，而是在制造结构。他们逐渐地把语言的理想本质看作一种和客观现实相脱离的独立的体系，把形式化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最终目的。这就使汉语研究长期幽闭在象牙之塔中，无法解释汉族人语言运用的现实，无法科学地认识汉语的社会文化功能，并加以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无法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

“纯正的”语言研究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所以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先后兴起。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

象是人类的全部言语活动。决定语言在具体社会中所呈现的面貌，并且最终说明它在时间上所经历的变化，正是它作为交际工具的用途以及语言多方面地逐渐融合于现实界的其他现象，语言的实际决不象“纯语言”研究者所设想的那样简单。社会语言学认为，任何语言集团里都存在着语言变异和不统一的语言结构。“纯净的”语言集团不过是一种神话。语言的不“纯净”是正常现象，这是语言中许多基本因素互相起作用的自然结果，没有风格变化，没有几种不同层次的语言系统并存，反而会使语言功能失调，一个人掌握一种语言的能力不仅在于语法知识，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跟谁谈什么事，什么时候谈，在什么场合谈，用什么方式谈。吕叔湘先生说：“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言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用这种工具。一联系到人，情况就复杂了。”“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现在研究的范围更广大了，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更宽阔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细密更多样化了，可以预期有更丰富的收获。”事实正是这样，自80年代开始，我国语言学的视野逐渐扩大，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言语交际学、应用语言学等新学科纷纷兴起，新成果层出不穷。语言研究进入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满腔热情地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

际，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语言学转折。语言的世界真正成了一个大千的世界，一个风光无限的世界。

这套丛书以及我们主编的另一套“文化语言学”丛书，正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也就是从“人”的角度来阐释语言的功能和价值的。在我们收到的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中、青年语言学者的数百个选题中，内容涉及儿童语言、广告语言、文学语言、交际语言、演讲语言、礼貌语言、谈判语言、体态语言、方俗语言、幽默语言、宗教语言、生物语言、字谜语言、恋爱语言、姓氏语言、新词新语、教学语言、艺术语言、吉利语言、禁忌语言、外来语言、社会方言……等等，在这个语言的大千世界中，我们的语文工作者们正以满腔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精神从事着前所未有的语言学现代化事业。

大千语言世界风光无限，中国的语言学正期待着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和文化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接受这套丛书，使我们向社会和学术界推出这批成果的努力终于成为现实！

申小龙 李运富

目 录

纵横扫描：疑惑、歧途、求索

- 旧故事引出的新疑惑…………… (1)
语言学 and 文学的歧途…………… (6)
迷路者的足迹…………… (12)
文学家的“语言学”之一：兴寄说 … (17)
文学家的“语言学”之二：意会说 … (22)

“迷宫”之秘：情感—形象—语言

- “酒”乎？“瓶”乎？…………… (29)
“情动于中”之后…………… (38)
建造“心灵的窗口”…………… (46)
“文学指纹”的来由…………… (52)

文学家的遣词艺术

- 还从“春风又绿江南岸”谈起…………… (59)
艺术迷宫的建筑材料…………… (66)
3.1415926 与“白发三千丈”…………… (73)
临时新造的独特词语…………… (82)
取名——一种特殊的构词艺术…………… (89)

异于常规的语言构造方法

- 狂人的话与文学家的语言…………… (96)
超常的词语组合方式…………… (107)
壶、杯的位置与“意合法”…………… (115)
精心安排的转折…………… (123)
语调的运用与音乐效果…………… (128)

不仅仅是语言表达手法

- 文学家笔下的比喻（上）……………（136）
- 文学家笔下的比喻（下）……………（145）
- 冗词赘句的妙用……………（151）
- 化错为美……………（159）

纵横扫描

疑惑、歧途、求索

旧故事引出的新疑惑

这是些“老掉牙”的故事：贾岛因“推敲”而冲犯京兆尹大人的仪仗队；王安石如何改“到”字为“绿”；契诃夫记了十大本语言笔记；高尔基由于一个词不够理想而一再推迟作品的付印……从孩提时代起，一直听到现在，可谓“百听不厌”。感动之余，心里不禁暗暗地疑惑：天下写文章的，运用语言的，并不仅仅是作家、诗人呀，为什么说来说去，就只有他们那样致力于语言的锤炼？科学家、思想家等等，也写文章，也用语言，为什么至今几乎听不到他们锤炼语言的故事呢？

是笔者孤陋寡闻？是说故事的人有偏心？似乎也不见得。因为，除了这些故事之外，我们确实还读到不少文学家关于运用语言的名言，如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

述》)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和青年作家谈话》)叶圣陶说：“离开语言无所谓文艺。”(《叶圣陶选集》自序)由此看来，语言对文学家之重要，是不容置疑的了。不对，语言对于科学家、思想家等等，就不那么重要么？也未见得。“没有语言无所谓文艺”，没有语言就有所谓科学么？假令世界上没有语言，人类则至今尚未脱出动物界，思维还停留于低级阶段，社会也不存在，一切文明，包括文学、艺术、科学、哲学、道德、法律、教育等等，都无从谈起！

不妨也找一些科学家关于语言的论述吧。他们这方面的名言虽不算多，还是可以找到的。最有代表性，可算孔子的一句话：“辞，达而已矣。”(《论语》)由此看来，在他们眼里，象“春风又到江南岸”这样的语言，已经将季节、地点说清楚，算得上“达”了，将“到”字改写去，实在没有必要。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出的一套完整而又丰富的语言，只要好好掌握，要做到“达”即通畅是并不十分困难的。因此，陈景润也曾象贾岛那样冥思苦想，但他所思考的不是“推敲”而是“哥德巴赫猜想”；李四光也曾象契诃夫那样收集，但他所积蓄的不是语言笔记而是岩石标本。

文学家却不同。他们对语言的追求，可以概括为：“语不惊人死不休。”怎样才可以“惊人”呢？韩愈说：“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惟陈言之务去”；然而他接着又说：“戛戛乎其难哉！”(《答李翊书》)确实，要做到“惊人”，是要比做到“达”不知难多少倍！无怪乎他们常常为一个词、一句话，反复修改，苦心孤诣，冥思苦想，废寝忘食，全然不亚于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挺

进时那样如痴如醉的境界，亦不亚于米开朗雕刻圣母抱基督遗体像时“以烛目洗脸”的状态。在王安石看来，“春风又到江南岸”“达”是达了，只是不“惊人”，因而他要“到”字改为“过”，又改为“入”，再改为“满”，还不死心，最后改为“绿”，才肯罢手。契诃夫的十大本语言笔记，所记的无非是些“惊人”或接近于“惊人”的句子，倘若他把所听到的通顺句子统统记下，那么即使记一千本也记不完，也不会有多少用处。

正如陈景润被称为“数学怪人”一样，文学家——至少是杰出的文学家，也可称作“语言怪人”，他们常常别出心裁地创造一些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语言。也正是这些语言，使他们的作品格外生色，令读者拍案叫绝，难以忘怀。就拿杜甫为例，他有不少诗句，的确是达到“惊人”的地步的。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其中“垂”和“涌”二字就很不寻常。乍看起来，星星怎么会垂下？月亮又怎么会随江流涌出？然而细心一想，又觉得确有这种景象。又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明明是人溅泪，却说成“花溅泪”；明明是人惊心，却说成“鸟惊心”，这正是老杜“下笔如有神”之处。李白的名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秋浦歌》）更出乎人之意料。人的白发怎么也不会有三千丈那么长，“愁”又怎么可以用尺丈计算呢？然而谁也不会指责这位“诗仙”荒唐，反而称赞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古代文学家如此，现代文学家亦如此；诗歌如此，小说散文也如此。试看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一段：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象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作者把月下荷塘描写得这样美，使人无法不折服，无法不为之所吸引。如果换成这么一句：“月下的荷塘很美丽。”意思也是明白了的，可魅力就完全没有了。

不妨再举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开头一段：

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足以信赖的时代，这是背信弃义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前面一片大好，我们前面一无所有；我们全部直上天堂，我们全部直下另一端——

一共七组在意义上相对立的排比句，令人目眩。这样的语言，在科学家或思想家的著作中是绝对找不到的，也是不容许的。然而，还有比这更加古怪，更为奇特的呢。请看：

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地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

这是王蒙的小说《风筝飘带》开头一段。作者将传统语法习惯撇在一边，读者很不容易看清句子结构，只看见一大串似乎有联系、又似乎毫不相干的意象，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对于这样的语言，有的人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然而不管如何，它确实如期地把读者带入了小说所创造的那种朦胧的、诗意的艺术氛围。

可见，“惊人”和“达”是两种不同的要求。文学家笔下那些“惊人”的独具一格的语言，并不一定符合“达”的标准，其中，有的晓畅，有的朦胧；有的平易，有的奇特；有的合乎常规，有的则超乎常规，上面所举各例便是如此，但不管如何，这些经过文学家一番锤炼的语言，同日常交际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确实大不一样。正如锤炼钢铁，原来是矿石，经过熔铸和加工，就变成各种各样的器具或工艺品了。这种经过文学家锤炼加工而写入作品之中的语言，就是艺术语言。

语言学与文学的歧途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始终高度重视语言的，除了文学家之外，还有语言学家。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学则是“语言科学”，它们都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照理说，应是情同手足，亲如姐妹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国最初的语言学叫做“小学”。这种“小学”不是现在孩子们读书的那种小学，然而顾名思义，总算不上什么高深的学问，只是“大学”即经学的附设，任务是为“经书”的词语作注释，做启蒙工作，因此，“小学”也列入“经学”的范围。既然如此，对那些无法列入经书的文学作品，它理所当然地不加理睬。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却是个例外，因为它不仅有幸挤身于经书之列，而且被列为“五经”之首。不过，它既然属于经书，就得以经书对待，按经书的语言去解释。《诗经》毕竟是本诗歌集，又怎么可以按经书的语言来解释呢？这可就难为那些“小学”家了。试以《国风》第一篇——《关雎》为例，开头四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弄得“小学”家引经据典，穿凿附会，费尽心

机。其实从字面看，并不费解，意思是：睢鸠“关关”地歌唱，在河中的沙洲上。美丽的好姑娘啊，和君子是天生一双。“小学”家们却不管这些，他们煞费苦心地考究“睢鸠”有何“来头”。《毛传》的结论是：借喻天子后妃的良模，诗中的“君子”就是天子，“淑女”就是后妃。颇善于考证的宋代大学问家朱熹，则进一步在“关关”二字做文章：“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诗集传》）照他所言，似乎动物也有语言，也懂得谈恋爱了。朱熹毕竟并非生物学家，提不出什么根据。后人也没有证实“关关”确是雌睢鸠和雄睢鸠“谈恋爱”的用语。不过，就算是吧，在日常生活里，又有哪一位“君子”在向“淑女”表示爱情时，先要引述一番睢鸠的叫声？更何况天子后妃！好歹朱熹还写过些诗，对文学还不算百分之百外行，尚且如此解释，那些道貌岸然、不愿沾文学之边的经学家们就更不用说了。总之，他们并不是研究艺术语言，而是把《诗经》中作品的语言完全当作经书语言来解释，因而把一首普通的情歌弄得面目全非，越解越费解，真是“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

“音韵学”兴起之后，情况似乎有些改观，起码诗歌的语言是踏进了语言学著作的“大雅之堂”。然而进是进去了，命运并没有好多少，因为音韵学家所关心的只是它的平仄、押韵，至于其他方面，他们是不去理会的。待“语法学”产生，形势便又急转直下。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就直言宣称：他著这部书，是“取《四书》、《三传》、《史》、《汉》、韩文为历代文词升降之宗，兼及诸子、《语》、《策》”的。在

在他看来，可充当“历代文词升降之宗”的唯有《四书》、《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史记》、《汉书》的语言，这回他干脆连《诗经》也排除了。不过，最后总算提到了韩愈，但他所说的“韩文”，指的是议论一类文章，我国古代的散文中，属于纯文学的艺术散文并不多，在《韩昌黎全集》中更是寥寥无几。至若真正的文学作品，包括韩愈的诗歌，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等的诗歌，柳宗元《永州八记》一类散文，还有《西厢记》、《牡丹亭》等戏曲，《水浒》、《红楼梦》等小说，它们的语言，是充当“兼及”作例子的资格也没有的。

这里，我并非有意责难马建忠和他的同行们，更没有抹杀他们功绩的意思，只不过想说明这么一点：起码在我国，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确实早就不是同道而行的。这倒不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而是彼此的目标不同，着眼点也不同。同是面对着语言这个百花园，语言学家致力于从常见的花儿中发现一些共同的规律；文学家则不满足于那些司空见惯的花朵，总想为这花园添点异彩，或将花儿弄成千姿百态的盆景，或想方设法培养一些稀世新花。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指出：“‘习惯’是语言的裁判，它统治语言，它给语言定出准则。”因此，语言学中的那些“准则”，其实是“习惯”的统治意志的体现。而文学家呢，总不愿服从这个“裁判”，总不愿意服从它的统治，我行我素，不惜违背根据“习惯”的意志而定出的种种准则，这就难怪二者分道扬镳了。

文学毕竟是文学，它不是现实生活的直录，不是现实生活机械的再现。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也

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直录，而是经文学家锤炼加工的艺术语言。《关雎》的作者倘若只是把那位“君子”向那位“淑女”求爱的话照直录下，那还成为诗吗？这位不知名的作者虽然不一定算得上天才，但起码是懂文学的，一开头就咏一番“雎鸠”的叫声，以表现“君子”见到“淑女”时那种喜悦心情。屈原的《离骚》更是如此，在作者笔下，草木、虫鱼、花鸟、禽兽、风雨、雷电，都有了活力，有了生命，从“习惯”的眼光去看，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从文学的眼光去看，这正是高明之处，奇妙之处。在文学家笔下，白发可以长到三千丈那么长，花儿可以掉下伤心的泪珠，半径达 6371 公里的地球可以捧在人的手上……“习惯”定出来的准则，已经毫不起作用，已经被他们抛到了一边。

美国语言学家马提索夫指出：“语言学家更多地关心把规则表述得漂亮、精确，具有数学的严密性，而实际上不能忠实于所研究语言的精神实质。有时候语言材料是庞杂的，或不规则的，或不匀称的，而生成语法又试图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象数学那样精确。”（《语言学论丛》十三辑）这段话虽然针对的是“生成语法”，但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语言学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语言学正是沿着这条模式化、圈定化的路子走过来的。我国古代的“小学”，是力图使词语的解释固定化；马建忠所引进的语法学，则是力图使句子的结构模式化，他的这套语法模式到底是否适用于汉语，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起码，它对那些看起来是“满纸荒唐言”式的艺术语言，确实是无能为力的。“秦时明月汉时关”